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基本方法论的传承与创新\*

黄少安

**摘要:**研究对象统一和规范了所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符合这个一般性。研究方法、内容、范式和目的决定或赋予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有三个维度,在基本方法论维度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创新或特色:一是发展和完善了、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有意识地从中华传统的、优秀的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既符合人类合作性又切合中国作为公有制为主体的实际情况的文化元素,提炼成为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主义”。在创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一是处理好“一般”与“特色”的关系;二是处理好积累和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三是处理好通用学术语言与学术话语权的关系;四是处理好学理支撑与联系实际和服务现实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般性与特色 基本方法论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强调的,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点是研究和解决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要有实际应用价值。同时又是从“学科”的角度提出和强调的,肯定不只是应用对策,而是同时强调学理依据和理论的系统性。一个学科的创立、发展和创新,基本方法论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的和方向性的。本文试图研究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传承和创新。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 (一)研究对象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很广的谱系,笔者曾经给“政治经济学”下过一个定义:是指在分析解决经济问题时至少不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排除在外的经济学,也就是包含制度分析的经济学(黄少安,1995)。最早的经济学就是作为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后来众多经济学流派都是政治经济学,只有新古典经济学自认为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机制既定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所谓“纯经济学”,其实,它也是政治经济学,因为即使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也是需要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保障。因此,不管什么经济学,不管是否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其实都是政治经济学。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政治经济学,既有共性或一般性、又有各自的特色或特殊性。那么,什么因素决定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共性或一般性或同质性呢?是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确是对一门学科的研究内容、范围和方向的高度抽象和概括,而且一般都有明确的表述。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而且基本上能够界定清楚,这是一门学科产生和相对独立存在的前提。如果没有确定的、边界清晰的研究对象,这门学科不可能或不必要独立存在。如果一门学科的研究

\* 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250100,电子邮箱:shaohanhuang@sdu.edu.cn。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对象太多而且相互之间逻辑关系混乱,即使有人宣布它是一门学科,也发展不起来。当然,这么界定不是否认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一些问题可以或需要不同学科的人用各自学科的方法去研究,也就是所谓的跨学科研究或交叉学科问题。是否相同的研究对象决定是否是一门学科,决定或塑造的是共性或一般性。人类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经济关系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前者可以谓之(狭义的)生产,后者可以谓之或包括分配、交换和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因为经济学实际上永远都是政治经济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必须是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这几个方面的关系也可以概括为广义的“生产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可以说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重商主义经济学开始就是如此,古典经济学和后来所有经济学也是如此,新古典经济学也是如此,尽管自称为纯经济学即强调自己研究在制度既定前提下的资源配置,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可是它还是在研究人类的生产(在此的“生产”是广义的)关系即资源配置,包括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在市场中的互动关系,根本上是离不开制度和政策的。它强调“纯粹”无非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优越性、永恒性,还是在注重制度的重要性,强调市场机制也是重视制度,只不过它相信一种制度即市场制度、反对国家的政治干预而已,实际上也做不到完全排斥政治和政策干预。

最早的重商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没有涵盖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全部,其重点是流通领域或商业领域,研究如何通过商业实现国家富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涵盖了人类经济关系的全部,萨伊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拥趸和主要代表之一,1803年将斯密和李嘉图等的经济学理论改编为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概论》(萨伊,1803)出版,明确地概括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关系,全书也是按生产、消费和分配三篇来写的,可能是把“交换”视为市场机制的应有之意而无需提及了。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1821)在其《政治经济学要义》中也是以人类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部分。约翰·穆勒(1848)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虽然全书只分为生产、分配和交换三篇,但是在第一篇生产部分专门研究了消费关系。可见他们明确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的关系。《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界定:“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sup>①</sup>这显然是马克思《资本论》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对研究对象的界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出了广义的更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sup>②</sup>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马歇尔(1890)认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局部”。不管表述为四个方面还是几个方面,无非就是研究人类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或资源配置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不同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流派可能具体研究“研究对象”的某一个方面,经济学大师或体系构建者常常研究“研究对象”的全部,因此大师们的贡献往往是划时代的革命性的。随着经济学分工的发展和研究的技术化深入,能够研究经济学对象的全部方向和方面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少、甚至不可能,因此大师难以产生,当然,也许时代未到、社会需求还没有形成。不同经济学家和流派都越来越成为“摸象的盲人”,必须把不同“盲人”摸到的不同部位拼合起来才可能知道整体的“经济大象”长什么样,不像原来只要看一个经济学大师的书就能够了解经济关系这只“大象”。这种状态实际上大幅度提高了那些想或需要依靠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决策的人自身的识别、综合和选择能力方面的要求,如果不能进行识别、综合和选择,经济学家建议可能的片面性对决策的参考作用很有限,甚至可能导致政策或决策的“合成谬误”。当然,按照一般规律,社会各界、包括需要应用经济学理论成果的人,其整体素质包括识别、选

<sup>①</sup>《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sup>②</sup>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4页。

择、综合能力也是不断提高的,所以经济学的应用场景总体也会扩大。不过,作为知识和智慧供给方的经济学家们,出于理论自知和科学伦理,应该意识到自己对经济现实整体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的困难,在提供对策建议时有义务提醒相关需求方注意自己所“供给”的产品的局限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肯定首先要与其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致,就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基本关系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或者说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和人与人关系的(分配、交换和消费),具体就是研究特定国家(中国)、特定阶段(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关系。

## (二)研究方法、内容、范式和目的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或特色

经济学的共性或一般性是最体现本质的,它保证“经济学性质”和“普遍可接受性”。经济学的特殊性或特色是体现个性、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的因素,特色是在一般性的基础上塑造出来的,有些特色根本不需要有意识建立或塑造,只要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自然就会赋予不同的特色。同一学科内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不包括基本的通用的话语体系)和研究目的(可以具体化不同目标)决定同一学科内部不同的学派,学派又可以分为大学派和大学派内部的小学派或学派内部的分支。研究方法、内容、范式和目的等决定或塑造的是个性或特殊性。例如,比较斯密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虽然二者都研究人类经济关系及其演变规律,并且都坚持劳动价值论,这是其共性。但是,斯密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坚持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三位一体的基本方法论,即强调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坚信有法律和道德约束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引导经济人最大化行为、达成社会福利最大化和资源最优配置。这是它的基本经济关系观,是对经济世界的主体认识和判断;研究目的就是要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讴歌和背书;内容方面,虽然是劳动价值论的创造者和坚持者,但是他们重点关注和研究生产领域,怎么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或增加劳动投入数量而创造更多的财富,关注劳动怎样创造财富,核心内容就是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坚持的基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用该方法观察和认识人类生产关系及其演变;研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论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必然灭亡;内容方面,虽然继承了斯密等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坚持的是经过自己创新发展后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理论和劳动力使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价值即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分配领域即劳动创造的价值如何分配,特别是剩余价值怎样被生产和如何分配,核心内容是劳动价值基础之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因为二者的差异或特色,使得他们成为不同的经济学体系或流派,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虽然都归于“古典经济学”,都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是有很大不同的古典经济学流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有三个维度:一是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现阶段常态化长期化的基本国情,例如,版图大国、人口大国、长期历史辉煌和短期屈辱落后的近代史以及全民族正在振兴的内生动力等,这些会影响民族观念、情绪、行为,从而影响经济关系,包括正式制度选择(所有制的选择、分配制度的选择)和非正式制度的存续及作用等,从而会影响和塑造立足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以“中国特色”。二是现代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更不是封建主义国家,总体上又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既有基本的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有其他多种所有制并存,既需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又需要计划机制引导资源配置和克服市场失灵。很多问题是既有政治经济学解释和解决不了的,例如,需要从理论上论证、从实践上操作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或统一。这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特殊问题必然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三是从现代化的进程看,中国正在迈向“中等发达阶段”。这样一个阶段既体现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又具有一些客观的必须予以正视、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中等发达阶段”本身不是中国特色,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经历,但是,中国到了中等发达阶段后有与其他国家同阶段不同的国情,例如,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虽然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总量增长率下降甚至负增长,但是人口总量仍然巨大,而且提前出现了老龄人口比例大幅度提高;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虽然递减却总量仍然很大,与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的距离还不小、从而

就业压力仍然很大。此外,还有人均收入中等与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居民生产性努力相对弱化和分配性努力相对强化的问题;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难的问题;等等。这些重要的阶段性国情既需要经济学深入研究和解决,也必然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中国的阶段性特色”。

总体而言,现阶段提出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解释和解决以下主要问题:在资源禀赋和其他约束条件下,中国经济体制(包括所有制及其具体的产权制度、分配制度、企业制度、资源配置机制)选择、变革和完善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调整问题;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如何转型、经济运行如何平稳以及调控方式问题;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问题;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的理性认识和应对问题;中国微观经济主体(各类企业和居民以及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特征和规律问题;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共治理(包括社区治理、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结构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把这些问题都解释和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创建起来了,既有科学贡献又有了实践意义。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论:既需传承也需创新

###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层次性

经济学的方法很重要,而方法又是分层次的。黄少安(1994)把经济学的方法分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或哲学基础、经济学思维原理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方法以及经济学的技术工具或方法”三个层次。很多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其实不是方法论,在经济学方法论学者或科学哲学家看来不过是经济学的具体技术工具,而且论及经济学方法时,常常在不同层次上跳跃。第一个层次也是最高层次的经济学方法才能称之为“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是最高、最抽象层次的方法,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观察、认识经济世界的认识论。它虽然深刻影响经济学家的价值观和经济理论的构建与发展,但是却不直接作用于具体经济理论的构建和表述,只是存在于经济学家的深层意识之中,构成他们的经济世界观,指导他们认识经济世界和构建经济理论,一般而言属于科学哲学的范畴。当然经济学家也可以是科学哲学家或者可以研究和讨论科学哲学问题,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大师同时也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专家,经济学发展历史上就曾经有过几次大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或论战,参与论战的几乎都是经济学大师,极大地推动经济学的进步。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主要从经济学的价值观、真理观的角度思考讨论方法问题,常常关注和讨论的内容有:如何认识和把握复杂而矛盾的经济世界及其变化;如何认识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什么是科学和真理,衡量真理和科学的标准是什么,经济学何种意义上是科学,科学与真理是什么关系等。第二个层次的经济学方法是经济学理论思维、构建和表述的方法。经济学家们常常讨论的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综合与分析结合的方法、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的方法、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方法、制度分析方法、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是经济学家在观察研究经济问题、思考理论原理和系统表述理论的直接方法,是经济学家可以具体使用、读者可见可分辨的方法。第三个层次的经济学方法是具体的技术性质的方法或工具,例如统计分析法、数理模型表达法、经济计量方法、边际分析方法、案例分析方法、大数据分析法等,这一层次的方法有助于经济学研究的精致化、准确化。三个层次的经济学方法,没有主次和重要性差异,不能认为哪个层次更重要,离开任何一个层次的方法,经济学理论都难以构建和完善。从既有的经济学发展历史看,第一层次即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一直有争论,即“主义”之争,常常是根本性不同、甚至对立的,相互之间是难以通用和妥协的,例如,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演化主义与构建主义的争论一直存在、谁也没有说服和战胜过谁。也许这正是经济学能够学派众多、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二层次上的方法,在不同经济学领域或不同经济理论体系中,有些可以通用或互补使用,有些却不行甚至是矛盾的。至于第三层次的方法,只要需要,都是可以通用的。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一般性和传承

创建和完善具有科学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既有的经济科学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即首先是传承,尤其是基本方法论的传承。传承什么?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三位一体。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或者政治市场理论)虽然直接研究政治领域,却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把政治领域视为一个竞争的政治市场,其基本方法论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一致。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也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其基本方法论也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黄少安,199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研究、解释和解决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属于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体现,应该传承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传承这一方法论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认识和判断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世界,提出、分析、解释和解决其中的问题。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学术界公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确定义和经典表述体现在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了方便读者,把这一段文字引用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sup>①</sup>其实,在此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有所表述,例如,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sup>②</sup>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认识以经济关系为主体的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认识论,强调人类社会演变的共同本质和规律,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经济力量尤其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二是强调人类社会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性地依次经历原始公有制社会、奴隶主私有制社会、封建主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最终必然走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放在现代经济学的视野中,就是一种观察经济世界及其演变规律的方法论,一种选择和评价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一般性标准。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特殊性或创新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保持基本方法论一致性的基础上,无疑需要创新,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基本方法论不可能完全适应现代中国的现实。基本方法论层次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要发展和完善唯物史观。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257页。

的表述确实很清楚、很经典,是那时马克思恩格斯的真实思想,而且很明显地强调一般规律和共性,显然是一个“本质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缺乏“历史主义”,缺乏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影响或反作用的关注,难以解释不同民族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制度的出现和变革不符合“五个阶段”的现象。其实,只要关注马克思晚年的著作和思想,就会发现,马克思已经把之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补充和完善了,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马克思研究了人类古代社会史,包括人类学、民族学,重点关注和研究了不同国家的历史状况,强调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时期的具体发展道路和体制选择的尊重。实际上,晚年马克思已经从本质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蜕变为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有机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自我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大大拓展了其可运用的范围和解释力。结合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完整和完善的唯物主义应该表述为四个维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情况下,生产力、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也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整个人类社会,大体上和一般性地经历五种社会形态演变,但是,特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可能有差异;长期的基本的制度演变,具有一般规律,人们的意志左右不了,但是短期的、具体的制度变革,人们是可以选择和构建的;一般而言,生产力条件和经济基础变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会变、也必然变,但是,具体或特殊情况下,这些条件和变的时间不是绝对一致或同步的(黄少安,2022)。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更加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和完善。

二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法论。迄今的经济学基本上是以“竞争”为主线的经济学,这不是既有经济学的错误,因为人类经济活动中本来就充满竞争,人性中也有竞争好胜的基本面,经济学的“自利经济人假设”也符合人性的客观性。但是,人性有两个基本面,除开“竞争”外,还有“合作”的一面。人类的“合作”倾向、“合作”意识和“合作”行为也是自人类产生开始就有、深嵌在人类基因之中的,因为自然力的强大和残酷使人类不得不成为群居动物,不得不相互合作。既有经济学对人类“合作”性的关注、解释是不够的。虽然现在的关注和研究在增加,但相应的经济学理论远远不像研究“竞争”的经济学那么丰富、深入。现实世界中,个体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本来可以合作或更好的合作,由于信息、机制、理念等原因,不能实现合作,甚至走向竞争、冲突和战争。现阶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关注竞争和竞争规则的同时,也应该更多地从观念和机制方面关注和引导不同主体之间更多地实现合作,尤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制度基础更能够促成合作,所以,在基本方法论层面上除传承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以外,可以考虑为“合作”的经济分析寻找或建立相应的哲学基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能够与经济学兼容的文化元素十分丰富,从中提炼出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元素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创新,至少有创新的可能性或方向。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多地具有“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和人与人和谐的因素,“和为贵”“和气生财”“中庸”等思想,还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以及主张收敛自己的行为,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主张人与人合作、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而且几千年以来已经一定程度上内化到中国人的血液中,体现在做人做事的行为中。所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经济学基本方法论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把这些文化中某个元素或某个词语直接拿过来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而是需要寻找、整合、提炼出符合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惯例话语,成为方法论的什么“主义”,才可能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之一(黄少安,1997)。“合作主义”“利他主义”还是“利公主义”或“集体主义”?都是可以探讨的(黄少安,2000)。

### 三、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现阶段创建和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需要理论自信,又需要准确的自我认知,需要处理好几个重要的关系:

一是需要处理好“一般”与“特色”的关系。首先要具有经济学的一般性,其次要符合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的一般性。必须从研究对象清楚界定,研究的是经济学的问题,可以不是“对象”规定的全部,但是必须“属于其中”,否则就不具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定性;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构建的经济学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针对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作为指导创建的经济学才可能是发展的、能够解释和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说是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为特色而特色,用“标新立异”的思维方法直接塑造经济学的“特色”。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只能在符合经济学一般性的基础上形成或者有意识塑造,没有一般性作为基础的特色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特色,可能是经济科学的“异类”。

二是需要处理好积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任何一门科学的创新都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在知识积累基础上的、跟随性的、边际上的创新,是对既有的重要科学理论或理论假说的补充、完善和拓展,包括证实或检验,可以称为“边际创新”,这种创新对于理论的检验、完善和运用非常重要。另一种是在知识积累基础上的、挑战性的、颠覆性或革命性的创新,是对既有理论的证伪或重大改变,对于科学发展的贡献往往是里程碑或划时代的。但是,不管哪一种创新,都必须建立在既有科学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没有知识的积累和传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经济学的创新也是如此。其实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非常丰富并有理论深度,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研读才可能领悟其精髓。对既有经济学各流派、包括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必须有足够的学习和研读,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在这样基础上创建出来的才是经济学。不能不顾既有经济学的知识和贡献而思考创建有特色的经济学。

三是需要处理好通用学术语言与学术话语权的关系。每一门科学从创建开始,就会逐步形成一套大家都接受的定义统一或基本统一的基本概念和语言表达方式、基本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表述方法等,这些就构成该学科的“通用语言体系”,其最大的作用就是便于同代学者之间高效准确地沟通和代际之间知识积累和传承。就好像在中国大家说普通话、用简化汉字和在国际上更多用英语一样,不会普通话及简化汉字和英语的少数人要努力学习,可以方便沟通、降低沟通成本。这样是符合经济学的成本节约原理的。少数人不能因为自己不会通用学术语言、不能参加正常的学术讨论而认定存在学术语言歧视,使得自己没有学术话语权。于是自己另造一套话语体系,并且视之为创造和争取“话语权”。这样做一方面成本太高,另一方面难以取代多数学者使用的通用学术语言。从总体和长期看,学术话语权基本上是学术实力竞争的结果,不要过度地把学术话语权视为学术歧视,也不能无视通用学术语言自创语言体系和话语权。

四是需要处理好学理支撑与联系实际服务现实的关系。任何经济学的理论,不管是表述的高深复杂还是简单明了,都是基于现实建立起来的,都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对象。因此,只要是真正的科学理论,本身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或者可以联系实际和还原于实际的,从根本上就没有脱离实际的可能性,只是有些人对理论不懂、对现实看不透,才会理论脱离实际。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常常会有不少经济学者就经济问题向不同的受众发表应用对策性意见和建议,有些也可能有针对性、起好的作用,有些未必甚至起相反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基本理论功底好、善于融会贯通的人视为能够“接天气”者,把能够运用理论观察现实、敏锐发现现实中的问题及其本质、能够提出针对性的有用建议的学者视为能够“接地气”者。两种人的关系是:专门从事基本理论、而且确实功底好的人,即“接天气”的人不一定能够“接地气”,但是,不能够“接天气”的人肯定不可能真正“接地气”,至少不能很好地“接地气”。从科学意义上观察现实、了解现实是需要理论方法和工具的,否则,既可能视而不见,又可能见而不懂,还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常说的看到的现象不一定是事实,看到的事实不一定真相,看到了真相不一定看到本质。还有一种情况,即使看到单个事物的本质,也不一定能把相关的不同事物及其本质都看透并且发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时很可能错误或不准确,或单个意见没有错误、不同方面建议合起来就错了,即“合成谬误”,根源就在于不接“天

气”或者没有接好,即基础理论功底不够,不能融会贯通,看不清现实。真正能够做好经济学应用对策研究的,必须具有很高的经济学职业敏感度,能够和善于观察现实,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行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分析的基础上必须综合,才可能提出好的对策,这种人必定是经济理论功底很好的人。现实中确实有些人,可能长期从事过经济实践或者学过一些经济学理论但是没有学通或者只是通过大众媒体学过一些经济学知识和经济方面的知识,就敢于就经济现实的众多领域发表意见,不排除其中确有人有时候能够看到某个点的某个问题并且说到了关键,但是不一定就能够提出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对策。但是,这些人能够看得清、说得清的概率肯定低于他们看不清、说不对或说不准的概率。这种忽视基础理论、没有学理支撑的对策建议误导决策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国家特别强调理论研究要联系实际、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应该如此,但是,必须是在基本理论功底扎实、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培养职业敏感性,系统地观察、分析现实后加以综合,才能谨慎地提出对策建议。

#### 四、总结

综上所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统一和规范了所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符合这一一般性,是研究特定的中国、特定阶段(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经济学。强调特色是认可或暗含一般性为前提的,特色或特殊性是在一般性基础上形成或塑造出来的。研究方法、内容、范式和目的决定或赋予不同经济学流派以不同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有三个维度:一是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现阶段常态化长期化的基本国情赋予其“中国特色”;二是现代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赋予其“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三是中国迈向“中等发达阶段”特有的阶段性国情赋予其“社会主义中国的阶段性特色”。经济学方法分为三个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要传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就不是中国化和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方法论层面上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创新或特色:一是发展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综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特别是晚年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把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述为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结合的方法论。二是有意识地从中华传统的、优秀的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既符合人类合作性又切合中国作为公有制为主体国家实际的文化元素,提炼成为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基本方法论之一。在创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几个主要关系:一是处理好“一般”与“特色”的关系;二是处理好积累和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三是处理好通用学术语言与学术话语权的关系;四是处理好学理支撑与服务现实的关系。

#### 参考文献:

-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马歇尔,1890:《经济学原理》(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
- 约翰·穆勒,1848:《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商务印书馆2009年中译本。
- 詹姆斯·穆勒,1821:《政治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2017年中译本。
- 萨伊,1803:《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中译本。
- 黄少安,1994:《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第3期。
- 黄少安,1995:《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 黄少安,1996:《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黄少安,1997:《创建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江海学刊》第5期。
- 黄少安,2000:《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经济研究》第5期。
- 黄少安,2022:《完整的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选择与改革》,《学术月刊》第2期。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Basic Methodology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UANG Shaoa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China)

**Summary:** At present, one of the directions and hot topics of discussion in China's economic academic community is how to create and improv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power of economics", which forms the unique academic background for writing this paper. In response to certain phenomena observed in research, it is deemed necessary to conduct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aspects of economics, and how to shape the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ims to address potential misconceptions that may arise in this context.

The main content and viewpoints of the paper are as follows: (1) Research objects unify and standardize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all political economies, and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ust adhere to these general principles. (2) Specificity or particularity emerges from this generality.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content, paradigm, and objectives differentiate and endow various economic schools with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3)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three dimensions of uniqueness: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the ongoing fundamental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confer it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dern China as a socialist country gives it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t China"; and China's curr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at a "moderately advanced level" and its specific circumstances within the "middle-income phase" contribute to "stage-specific socialis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 The methods of economic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basic methodology or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s, the methods for constructing economic thinking principle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the technical tools or methods of economics. (5)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nd refining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volves handling several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the balance between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the interplay between accumula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al academic langua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cademic discursive power,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serving reality.

Innovations of the paper are as follows: (1) Integrating Marx and Engels' later thoughts, it develop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o a "complet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combines essentialism and historicism. (2) It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 framework for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t China, and stage-specific socialis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It suggests a categorization of economic methods into "three levels", with ongoing debates and struggles among different economic schools at the first level, which pertains to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The third level is generally applicable, while certain aspects of the methods at the second level can be shared. (4) It encourages the exploration of valuable element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ncorporates them as the fundamental methodology, constituting one of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It uses the term "Chinese economic school" rather than "Chinese economics".

**Keyword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iversality versus Particularit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Basic Methodology

**JEL Classification:** C03, F011

(责任编辑:冀木)

(校对:朝东)